

晚清出洋五大臣被炸案



探讨晚清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及其历史意蕴的论文堪称汗牛充栋，然而，当时的爆炸现场究竟如何？已往研究所据资料多是二手文献。其实，有不少一手资料记载爆炸案发现场，包括当事人的日记。日记作为私密性的史料，反映当事人所思所想所感，因而别具价值。尤其是几种涉及现场的日记互相对读，更有助于揭开历史书写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面，从而还原出更为立体而丰满的在场历史情景。为人熟知的一份史料即出自“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之手。戴鸿慈是广东人，因为出洋考察立宪而迅速升迁。在出洋五大臣中，戴鸿慈最为勤勉负责，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出使九国日记》，正是在这份日记中，我们得以窥探当时的历史现场。

作者 尧育飞
《书屋》编辑出版

出国考察中断

戴鸿慈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日记载：“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送行者伍秩庸侍郎受震遁迹，两耳为聋。惟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已。余等商定，改期缓行。徐、端两大臣往练兵处，绍大臣往法国医院治创。余遂与泽公先归。抵家，朋辈咸集慰问。自惟托朝廷厚福，履险如夷，合家欣幸。少憩，往练兵处晤徐、端两大臣，商定备折奏陈，明早呈递。因即命车赴园。晚，至海淀，徐、端两大臣继至，同访铁宝臣尚书寓园。晚膳后，赴万兴堂宿。”

出国考察因炸弹袭击被中断，毕竟是大事。第二天，戴鸿慈就早早进宫，先到军机处禀报一切。八点，慈禧和光绪帝召见了他们，除载泽和绍英请假外，其余三人均面见皇上。日记如是记载：“承皇太后、皇上慰劳有加，又问泽、绍伤状及当时情形。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厪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谨陈词宽解。问答逾时，乃出，至海淀用膳。午后，往法国医院问绍大臣、萨郎中伤，均已见效。惟萨内弟已身故，其从弟亦垂危云。是日计毙三人，伤十余人，真无妄之灾也。闻凶手已在炸毙之列矣。往候伍侍郎问好，以聋不能见客，申刻归寓。是日承赐酒席，并传旨免其谢恩。”看来，五大臣启程遭到刺杀一事，引起慈禧无限感慨，连她这样一个在晚清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开始感叹办事不容易了。觐见之后，戴鸿慈前往医院探望绍英和萨荫图，两人恢复情况甚好。这时，戴鸿慈才知道扔炸弹的吴樾也被炸死了。

慈禧的感慨并非惺惺作态，毕竟，八月十九日（9月17日），慈禧曾面谕出洋五大臣，训诫他们“以留心考察、以备采择等语，拳拳珍重，祝以一路福星”。重申出洋五大臣遭受炸弹袭击的历史现场，有必要将时间回放一个礼拜，来到农历八月十九日（9月17日）。这一天，《徐世昌日记》记载：“未明起，入直。召对后，偕泽公五人请训，勅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认真考察，将来好采取有用。并蒙奖以‘汝等五人出去，朝廷甚为挂念等语，并谕以‘愿汝等一路福星。’《徐世昌日记》记载得较为简略，但从中已可见慈禧和光绪对此事的重视。但五大臣面见慈禧时究竟说了什么，《徐世昌日记》没有记载。此时，我们需要借助日记对读。试看《绍英日记》，则有较为详细的披露。《绍英日记》记载绍英与载泽等人“随同请训，蒙恩召见。皇太后、皇上训勉周详，示以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如宪法事，现在虽不能宣露，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以备采择。并蒙赏赐‘一路福星，之吉语。天恩高厚，应如何敬谨考察，

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是日至军机诸位处辞行，惟廉大人未见。庆邸云泽公与你们二位如考察毕，亦可先回，并可至福建一看也。次日蒙恩赏路菜、点心八匣。并云不必往谢恩矣。”慈禧太后几乎掏心窝子说话，除了勉励出洋诸大臣考察各国政事之外，还特别提示立宪事宜。1900年以后，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颇有反复，但总体而言，慈禧确实是在持续推动立宪，尽量朝立宪派的呼应看齐。

当天觐见圣上的活动结束后，绍英还去军机处与诸大佬辞行。而第二天，五大臣都获得慈禧的赏赐。赏赐的菜肴，绍英记载得简略，仅提及他送给宫中来领赏人员“茶敬四两”，至于挑夫，绍英也赠送了“十二千文”。而《徐世昌日记》则予以细致罗列，云：“本日蒙恩赏饌饽、月饼、酱肉、香肠、小肚、茶叶等食物八盒，传谕不必谢恩。”不必谢恩，当然是来自帝王的莫大荣遇了。从《绍英日记》和《徐世昌日记》这段细节可见，绍英办事细心，日记多记家国大事，而对皇帝赏赐的内容本身并不在意。而徐世昌则对食物等细节看得较重，对军国大事反而认为不必在日记中记载。在此，也可略略管窥绍英与徐世昌两人的处事风格。

五大臣的伤情

五大臣的伤情如何，根据戴鸿慈的记载，总共有三人被炸死，十几人受伤。其中随团成员萨荫图一家伤亡最大，其内弟被炸死，从弟也重伤。而伍廷芳被炸弹震聋耳朵，造成短暂时失聪。

其他人伤势如何？戴鸿慈当然有关心，他注意到载泽眼角受伤，注意到徐世昌受火灼伤。他也曾去法国医院看望绍英。但绍英受伤的具体情况如何？戴鸿慈的关心显然有其限度。毕竟，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观察世界，戴鸿慈当然不例外。故而，探寻绍英的伤势，应回到绍英本身。且看《绍英日记》光绪十一年9月24日记载：“早赴前门东车站，会同泽公、徐夫。甫登火车，忽闻炸炮一声。当时跌倒，随有家人扶出，身受伤七八处，惟左股较重，即至法国医院调治。同去者为服部先生。医士欧宜穆、沙荷德调治甚效，暂在医院调理。”绍英的伤情于还是比较清楚，受伤七八处，左大腿受伤较重。绍英前往法国医院治疗，同行者居然有日本人服部宇之吉（1867—1939）。服部宇之吉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服部宇之吉也参与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送行仪式。欧宜穆为法国驻华大使馆医官，也在医院兼职工作。

绍英所受伤害看来的确不重，第二天他仍在记日记，云：“会銜具奏车站匪徒施放炸弹事，蒙恩派太監至家看视，并赏食物。天恩高厚，感激莫名。”不过此后住院中，绍英的日记就中断了。也许是病情不容许他记日记吧。直至九月初五日，绍英才恢复日记记载，云“由左股起出炸弹之钢子一枚。幸西医施治得法，虽疼痛，尚能忍耐”。这时，我们才知道绍英当日被炸，曾有炸弹弹片射入

左腿，所以伤情较重。经过西医有效调治，九月六日，绍英“由医院归家”。至此绍英的伤情已基本痊愈。

出洋五大臣被炸弹袭击的历史现场，《徐世昌日记》的记载也值得关注，当日记载云：“晨起，检点琐事。祖宗堂前婶母位前行礼。起行至前门外车站，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登车后将发，忽炸弹爆发，烟气弥漫，车轨震损。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斃路三人，送行者受微伤者甚多。随员萨荫图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炸碎一人，似施放炸弹者。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停车不行，到练兵处草奏。”在受伤人员的记载中，徐世昌没有提及自己的伤情，可见他被火灼伤十分轻微。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萨荫图一家伤亡惨重。不过，徐世昌还是提供了现场受伤人员更多的情况，即他的仆人王顺受伤较重，且送行人也多受到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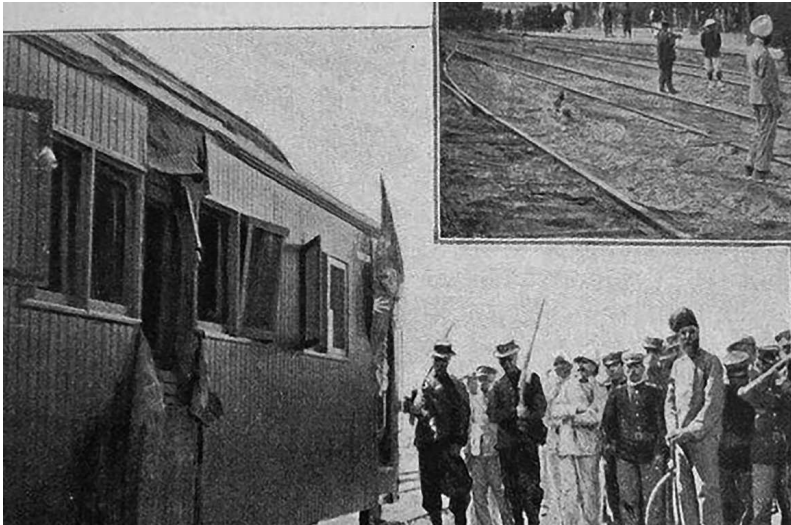
旁观者的记载

在爆炸案现场，几位当事人的记载如上。那么对旁观者而言，又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在当时的送行人中，还有一些人也有日记存世。如顺天府通州人王振声（1842—1922）。王振声为同治十三年进士，一直在翰林院任职，担任过会试同考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被授予徽州知府任。《王振声日记》记载当日事件为：“是日晴。辰起，赴前门火车站送出使五大臣启行。火车未开，炸弹发，绍越千受伤，火车毁，出使大臣不能行，皆散。至同丰堂小息，用饭后，拜客归。”王振声作为出使团的局外人，采取旁观者的眼光审视整个爆炸现场，故记载比较简单。而这一事件，对他的日常生活也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可见，对当时一般在朝官员而言，吴樾袭击五大臣一事在当时看来并未产生多大风波。可见，还原历史现场，不仅要看主角的表现，配角的观察同样不能忽视。既要看见某个事件对后世的影响，也有重新审视其在当日的有限意义。《王振声日记》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还揭示相同的时间在不同人那里记载的“不对等现象”。如，《王振声日记》第二天（9月25日）的记载，可补充绍英住院后的基本情况：“是日晴……晚赴万福居许席卿之约，顺道先至法国医院看绍越千，伤痕不甚重，少坐即出城。”可见王振声曾去看望过绍英。不过在《绍英日记》中，仅仅记载皇上令太监前来探视，未记载他人。可见，对伤病中

的绍英而言，探望者甚众，能够记载在日记中的，仍是来自更高的指示。一则可见绍英之膜拜皇恩的忠诚度，一则可见在高位者往往不屑于记载低

位者。一些随从人员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尽管他们并没有受伤。著名古文家吴汝纶之子吴闿生（1877—1950），原拟随绍英一道出洋考察，突发的炸弹令他行程受阻。9月27日，也就是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吴闿生悄然回到保定，并将现场情况如实告诉他的朋友贺葆真（1878—1949）。吴闿生在保定逗留十几天后，决定另做打算。《贺葆真日记》1905年九月十日（10月8日）记载：“吴辟疆来。辟疆以山东杨莲甫中丞电招，将委以济南学务，欣然欲往，乃来京辞绍公，不作海外游矣。辟疆游海外，凡所闻见，将必发之于文章，益于辟疆者甚大，乃以炸弹之故止其行，诚辟疆之不幸矣。”炸弹改变了吴闿生的人生规划，他决定接受山东巡抚杨士骧（字莲甫）的召请，去担任山东学务处委员。作为桐城派的盟友，贺葆真认为此事不利于吴闿生的文学与事业，为之感到惋惜。

对爆炸案的核心人物——出洋五大臣而言，突如其来的炸弹虽改变他们的行程，引发短暂的惊惶，但他们从心底认为这起刺杀活动不过是偶然事件，如徐世昌所言，是“可怪”而已，他们不曾料到这是革命党人此起彼伏的暗杀行动中一例，也不曾料到这件事对后来的晚清政局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炸弹案没有造成出洋五大臣的重伤，仅仅绍英受伤住院，而其他三人则是接连探望。如徐世昌在八月廿九日（9月27日）即“出门到法国医院看绍越千伤痕，谈良久。又看萨郎中”。他们互相看望和慰问受伤的同僚，与日常友朋之间的探望和慰问并没有多大区别。在他们眼中，这次炸弹袭击仅仅是一次意外，一件发生在京城的寻常治安事件。而对王振声这样的局外人而言，更是平常的一次意外事故。在探望了绍英伤病之后，王振声日记再不曾记载此事相关的任何讯息。他不过每天忙于奔赴徽州知府任上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20日，王振声乘火车南下赴任去了。不过，对王振声而言，他仍然记得9月12日面见慈禧时慈禧的训谕：“时事艰难，应飭州县官认真勤事，不可因循怠惰。现在兴办学堂甚要紧，须多设小学堂以开民智。”慈禧谆谆于民智的开启，某种程度上表明她已经是开明的改革派。这次爆炸事件并非重大事故。然而结果却是，一次信心满满的改革机遇，因一颗偶然性的炸弹而延期，因成效太慢而永远失去立宪的机会。晚清诸多日记为我们揭示个中委曲，细微处值得今人深思。



当年五大臣被炸案现场